

董蓮池◎著

說文解字考正

H161
D710

4
郑州大学 *04010246703R*

董莲池◎著

說文解字考正

郑州大学图书馆
2005 22
藏书

H161
D710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文解字考正/董莲池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5063 - 3157 - 8

I. 说… II. 董… III. 说文解字 - 考正 IV. H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7717 号

说文解字考正

作者: 董莲池

选题策划: 徐 潜

责任编辑: 王 旻

责任校对: 刘学青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http://www. zuojiachubanshe. com

印刷: 清华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800 千

印张: 48

插页: 4

印数: 001 - 3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157 - 8

定价: 18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卷首說明

- 一、本書是對許慎說解的考正和文本的整理。考正者，即是考而正之，旨在使《說文解字》更加完美，為大家提供一部更為科學的字學著作，這是作者撰作此書的動機所在，也是本書的學術價值所在。
- 二、本書作者是國內著名古文字學者和說文學者，研究古文字和《說文解字》有年，成果丰厚，有《金文編校補》、《中國文字學史》、《說文部首形義通釋》等有影響的學術專著行世。由於這一學養，使考正具有鮮明的古文字研究特色。
- 三、作者在考正中，着眼發展演變，利用可靠的古文字材料，詳論形體的來龍去脈，揭示字的真正本義。由於作者站在較高的起點上，使本書的成果在全面性、系統性、深刻性上刷新了以往的研究。
- 四、整理工作主要是對《說文解字》作句讀，施以現代標點，並用現代漢語拼音方案標注反切的讀音，以為人們使用《說文》和研究中古音提供參考。此外還對文本作了部分校勘。
- 五、整理所用的底本是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刊印”之清番禺陳昌治於清同治十二年據清孫星衍所刻大徐本而改刻之一篆一行本。該本卷首次有陳澧“新刻《說文解字》附通檢敘”，卷末附有番禺黎永椿編“《說文》通檢”兩冊，今避繁累，悉加汰除。每篇上、下結尾處均綴記“李承緒篆、黎永椿校、王國瑞覆校、陳昌治校刻”字樣，今除第十五篇下結尾處保留外，餘亦汰除。“孫氏重刊宋本說文序”後次有“說文解字標目”，十五篇上“說文解字敘”後亦次有《說文解字》部目，今為節儉，不加移錄。對底本避清帝諱造成篆文筆劃缺刻全予彌補，原版文字，力存原貌，移錄過程，凜凜小心，歷十餘校始付梓人，深恐失之毫厘遺誤後人。

- 六、書中考正用“今按”二字標識，書後附有“部首檢字表”和“拼音檢字表”。凡有考正的條目，均在表中字頭後用“▲”標識，以便考見。
- 七、反切注音嚴格按照切語，一“切”一音，兩“切”兩音。為照顧通常讀法，個別字增注了《集韻》、《廣韻》乃至今音（只限在同一義上）。“△”表示《集韻》音，“*”表示《廣韻》音，“（今）”表示今音。
- 八、底本中的小字注語（包括徐鉉增注的反切）一律用括號標識。新附字的說解和反切不加括號，以與許氏《說文》相別。
- 九、刊刻造成的明顯誤字，用[]號在其後直接注出正字。個別字頭的隸定作了從俗處理。
- 十、考正引用的下列書籍使用了簡稱：

《甲骨文合集》——《合集》

《甲骨續存》——《存》

《小屯南地甲骨》——《屯》

《殷墟文字甲編》——《甲》

《殷墟文字乙編》——《乙》

《殷契遺珠》——《珠》

《哲庵甲骨文存》——《哲庵》

《簠室殷契徵文》——《簠》

序：經學、小學與許慎

姚孝遂

許慎，這位我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以他畢生的精力，從事於弘揚與發展我國的傳統文化事業，並取得了廣泛和卓越的成就。關於他的生平，我們了解得實在太少，甚至連他的生卒年月也難以詳考。只知道他大約生活在公元一世紀中葉至二世紀初，早於馬融（78—166）而晚於賈逵（29—101）。公元一二一年（漢安帝建光元年），其子許沖上表時，許慎猶老病在牀，估計其年歲當已八十以上，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的推測。

許慎字叔重，由於他生於召陵，故人稱“許召陵”；曾任洧縣長，故人稱“許洧長”；又曾任南閣祭酒，故人又稱“許祭酒”。他是古文經學大師賈逵的弟子。許慎在其《說文解字》一書中，多次引證賈逵的見解，都稱“賈侍中”而不稱名，以示對老師的尊重。

許慎曾長時期從事經學的整理研究，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當時人稱“五經無雙許叔重”，給予極高的評價與推崇。可惜的是，他的著作《五經異義》及《孝經古文說》均已亡佚。漢代崇尚學術，經學鼎盛一時，設博士之官，以鼓勵對經學的整理與研究，能通一經，即可立為博士。

所謂“經學”，就是對先秦經典文獻的研究與整理。當時人們認為，六經皆出於孔子。由於《樂》經早已亡佚，就剩下《詩》、《書》、《易》、《禮》、《春秋》這五經了。至於後來的“十三經”，是將《禮》擴展成為《儀禮》、《周禮》、《禮記》，統稱為“三禮”；將《春秋》的“三

傳”，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也列為經；再加上《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就成為“十三經”。

由於師承的不同，資料來源的不同，更主要的是治學方法、途徑、方向的不同，漢代的經學分為今文經和古文經兩大不同的派別。從表面上看來，今文學派所根據的《經》是用漢代通行文字書寫的傳世典籍，而古文學派所根據的是孔子壁中出土的用戰國文字書寫的古籍。而實際的主要分歧在於：今文學派主張闡發圣人的微言大義，強調經世致用；古文學派則主張恢復古籍的本來面目，首先解決文字、聲韻、訓詁等問題，反對隨心所欲地解釋古代文獻。今古文學本來祇是兩個單純的不同學術派別，是根據不同的資料來源，利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同一個對象。概括起來說，今文經學是採用傳世的古籍，從哲學和史學的角度去研究經學，探索其中的微言大義，為當前的政治服務，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最初的代表人物是公羊學派的董仲舒。古文經學則是以出土文獻為依據，從語言文字學的角度來加以整理和研究，以達到恢復古代文獻本來面貌為目的，這一學派的奠基人物應該是劉向、劉歆父子。這兩個不同的學術派別後來演變成為不同的政治派別，則不僅僅是單純的學術問題了。

至於所謂“小學”，就其原始來說，則是由經學派生出來的一門學科。據《周禮》，國子八歲入小學，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所謂“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的“書”，簡單說來，就是文字。識字是小學階段的基礎教育內容之一，文字包括形、音、義，三者密不可分，其後逐漸發展成為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三門獨立的學科，將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統稱之曰“小學”，這就是“小學”得名的由來。

鄭玄的《周禮注》引鄭眾說，以“六書”為“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這與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說的“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以及許慎《說文解字》所說的“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在名稱上都大同小異，其次序也略有出入。

我們認為，《周禮》成書於戰國時代。《周禮》本身並未對“六書”做

過任何解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戰國時代，不可能具有關於文字形體結構規律及其運用規律的完整理論體系，祇有在全面而系統地對文字進行整理和研究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這種完整的理論體系。西漢以前未曾進行過任何有關這方面的工作，也不具備進行這項工作的條件，也未曾見過任何前此的古代文獻涉及這方面的內容。早期的字書，諸如《倉頡篇》、《史籀篇》、《爰歷篇》、《博學篇》均已亡佚，但從傳世的《急就篇》來看，僅僅是文字原始資料的蒐集，屬於識字課本的性質，絲毫沒有有關文字學理論的蹤跡。揚雄的《方言》，也未曾涉及文字學的理論。《周禮》所謂的“六書”，應該是指不同的書體。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曾提到秦書有“八體”，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在新莽時期，又有“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等“六書”。《周禮》“六藝”之一的“六書”，祇能是與秦書“八體”和新莽時期“六書”一樣，都是指不同的書體而言。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認識到，所謂“古文”、“奇字”即“大篆”；“篆書”即“小篆”；“佐書”即“隸書”；“繆篆”即“摹印”；“蟲書”即“鳥蟲書”。名稱雖略有差異，但在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

秦兼併六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清除異己，採取了一系列的嚴厲措施，焚毀某些典籍，禁止民間藏書，推行書同文等等，都屬於這些措施之列。漢興，革秦之弊，廢除禁止民間藏書之令，民間藏書大量出現，尤其是孔子壁中古文的出現，有力地促進了當時對先秦文獻的整理研究。

由於這些新出土的古籍是用古文書寫的，不同於當時的通行文字，這就需要有一些專門的學者對這些古文進行研究，對這些古文獻進行釋讀。當時朝廷也曾多次邀請有關學者講學，並設立專門機構，延聘專門人才校定整理古籍。著名的未央宮講學和東觀校書就是其例。西漢時期涌現出許多著名的學者，如司馬相如、孔安國、揚雄、張敞等，都精通戰國古文。然則可以斷言，西漢時期已經在文字、聲韻、訓詁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可以從以下的事實中得到證明，即至今

我們還可以見到像《方言》這樣有巨大影響的著作，在《漢書·藝文志》中已出現了文字學系統理論“六書”的完整名目。

經學的興盛，推動了小學的發展。而小學的發展，又為經學的研究奠定了科學的基礎。經學與小學的密切結合，這就是人們所統稱的“漢學”。

經學和小學都是較廣泛而籠統的概念。究其實際，經學包括哲學、史學和文獻學。小學則包括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到了清代，漢學復興，將經學和小學的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頂峰。尤其在小學方面，有著全面而巨大的發展。小學的內容更加豐富，除了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之外，又增添了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等新的內容。而小學的核心，是以“說文學”為基礎的。“說文學”又稱“許學”，以研究許慎的《說文解字》為主要對象。

《說文解字》，簡稱《說文》，完成於公元一〇〇年。從形式上看，是一部大型的說解文字的字典，是工具書的性質。但實際上這是一部總結自春秋戰國以來的有關研究成果，對文字的形、音、義進行全面探討，並就文字的形體結構規律、文字符號的運用規律從理論上加以闡述的具有創造性的專著。在此以前，我們祇有《爾雅》和《方言》。但《爾雅》和《方言》僅限於詞彙和訓詁，基本上屬於資料彙集性質，缺乏理論的闡述。

許慎有感於當時某些經師在說解經書時“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的混亂現象，表示極大的憤慨。許慎編寫《說文解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經學的研究納入科學的正確軌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為了“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至於方法和途徑，則是在於通過對語言文字本身規律的探索，使大家都認識它、了解它、遵守它。對於古代文獻的解釋，大家都必須遵守共同的準則，即符合語言文字本身的客觀規律性。許慎在其《說文解字敘》中非常明確地指出：“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不從文字著手，一切將成為毫無根據之談。

語言和文字是人類最偉大的系統工程之一，它是人類一切文明的基礎，蘊藏著無窮無盡的奧秘。人類文明之所以能夠持續不斷地得到進步和發展，

其先決條件就在於有了語言和文字。有了語言，人類才有可能交流信息，交流經驗，積累智慧。而有了文字，則能夠使經驗與智慧的交流和積累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如果沒有語言和文字，人類將永遠停留在原始階段，無法前行。

許慎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他非常明確地認識到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賴以垂後，後人藉以識古。他立志要通過對文字全面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來“究萬源”。無疑，欲通經學，必先明小學，這是唯一正確而科學的道路。正是由於許慎堅持不懈地努力，以及在小學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貢獻，才使得經學研究納入了科學的正確軌道。他的巨大的作用與影響，在我國歷史上延續了將近兩千年。而且仍將繼續不斷地發揮作用與影響。

許慎在當時被稱譽為“五經無雙”，非常可惜，他的經學代表作《五經異義》已亡佚，我們現在已看不到了。但是，僅僅從他對經學的嚴肅態度，以及他從文字、聲韻、訓詁入手的科學方法來判斷，他不是那些慣於“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的所謂經師者流所能望其項背的。

許慎治經，《易》宗孟氏，《書》宗孔氏，《詩》宗毛氏，《禮》宗《周官》，《春秋》宗左氏，《論語》、《孝經》皆為孔壁古文，是典型的古文學派經學家。但是在他的《說文解字》一書中，曾引用了董仲舒的見解，而董仲舒是今文學派的首要人物。這說明許慎在學術上並不存有狹隘的門戶之見，顯現出他的泱泱學者風度和寬闊胸懷。

據《後敘》，《說文解字》全書共十五卷，分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說解總字數為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現存版本與此略有出入。許慎在第十五卷《敘》中對於寫作的動機與目的、寫作的過程做了說明，尤其重要的是，他對於“六書”的理論做了詳細的闡述和論證。

我們應該承認，“六書”理論並非許慎個人創立的。因為早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就已出現了“六書”的全部條目。“六書”理論是西漢時期全面而系統地對文字進行整理和研究的總結。但是，迄今為止，我們還祇能從《說文》中見到關於“六書”理論全面而深刻的解釋和說明，並且實際運用於對每個文字的分析與說解。

應該肯定，正是許慎最終確立了“六書”理論，並通過說解文字的實踐，充分論證與發揮了“六書”理論。“六書”理論既包涵有文字形體結構規律，也包涵有文字的運用規律。現在還有人認為“六書”全部是造字規律，這純屬誤解。“指事”、“象形”、“會意”、“形聲”是文字形體的結構規律，“轉注”、“假借”是文字的運用規律，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我們從下列的事實中可以非常清楚、毫不含混地認識到這一點。這就是：所有的“轉注”字和“假借”字既可以是“指事”字，也可以是“象形”字、“會意”字或“形聲”字。反過來，所有的“指事”字、“象形”字、“會意”字和“形聲”字，也都有可能是“轉注”字或“假借”字。清代的許多學者如戴東原、段玉裁等早已對此進行了分辨，並已充分加以論證，他們的見解是十分正確的。我們還必須承認，《說文》關於文字的說解，並不完全是許慎個人的見解，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自春秋戰國以來通人達士的成說。許慎的另一偉大貢獻就在於：他蒐集並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資料及其有關研究成果。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釋讀商代的甲骨文和兩周的青銅器銘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賴於有了《說文》這部書。如果沒有《說文》，我們就會缺少溝通商周古文字與現代文字的橋樑，勢必會給研究工作增添更大的困難。

許慎是一位偉大的探索者。在當時非常有限的條件下，他全力以赴地探求整個文字體系以及每個文字形體結構的奧秘。也就是探求文字的本形、本音、本義，及其相互之間的聯係。他不滿足於知其然，而要進一步推考其所以然。他要窮根究源，弄清楚文字為什麼具有這個形，這個形為什麼具有這個義，以及這個字為什麼讀這個音的原因所在。由於許慎的努力，終於在這些方面打開一條通道，並積累了大量的經驗。這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但由於受當時條件的限制，他對於每個文字的結論不見得都能做到十分準確，毫無誤差。然而，他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確的。由他開創和奠定的文字學這一學科，或者說整個“小學”這一學術領域，為推動歷史學、語言學、文獻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許慎還有一項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偉大歷史貢獻就是，他對於我國文字的

規範和統一所起的作用。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的政治局面，以及文化的空前繁榮與發展，促進了通行的文字形體急遽變化。這是文字在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使文字形體的發展變化納入規範化的軌道，避免失去控制，造成混亂，這就需要適時地進行文字形體統一的工作。戰國時期某些有遠見的政治家已認識到這一點，曾經試圖做一些統一文字的工作。但由於政治上的分割局面，文字統一成為不可能。秦王朝實現了在全國範圍的政治統一，極力展開“書同文”的工作。許多歷史學家僅僅提到秦始皇在統一中國文字中的作用，這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秦始皇確實曾經做過某些促進文字統一的工作。但是，所謂“書同文”是用行政手段規定官方文書使用規範的文字，這種行政手段對於民間通行的文字並沒有起到多大的約束作用。因為為吏須“諷籀書九千”，同時還要試以“八體”。若是“書體不正”，則要加以舉劾。這種行政手段與廣大民眾是沒有甚么關係的。進而言之，小篆是由籀文省改而來，不管其作者是李斯還是程邈，這種字體與當時已廣泛通行的字體，距離太大。要想用小篆作為規範的統一字體，在事實上是是不可能的，何況秦王朝的一統局面，總共不過十四年，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是無法完成統一文字這一複雜工作的。從實際情況來看，秦書有“八體”，形體差別很大，並不統一。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西漢初年的文字，尤其是民間書寫的文字，距離規範化很遠。這足以說明秦王朝儘管採取過某些措施，做過一定程度的努力，但並沒有能夠使文字統一。

文字是人類社會約定俗成的產物。在一定的範圍內，人們必須使用大家共同都能識別和掌握的文字來記錄語言。同時，文字又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尤其是早期的文字，發展變化更為頻繁和突出。文字的規範和統一的工作，是一項長期的複雜工作。文字的統一，是要求大家共同使用規範的文字，行政的手段是必要的。但是，文字的規範化過程，是一個使大家理解、信服和掌握的過程，這就要求規範的文字具有權威性。而權威性是必須建立在科學性基礎之上的。在這一點上，行政手段就無能為力了。許慎的《說文》廣泛地蒐集了自戰國以來古、籀及小篆各種文字形體，通過對文字形體結構的理論性的分析，全面地說解了每個文字形、音、義的由來，具有很強的科學

性，從而也就樹立了權威性，其主張容易使人信服，成為共同遵循的一種準繩。《說文》所說解的主要是小篆，然而許慎關於小篆形體結構的科學分析，也對隸、楷形體的變化和發展，起著強有力的規範和約束作用。自從《說文》成書以後，文字的運用及其發展變化，就納入了規範化的軌道，所有文字的形體結構，一律以《說文》作為準繩。加上唐宋以來，開科取士，《說文》列為必試課目，則進一步加強了《說文》在實現文字統一中的作用。因此，將近兩千年來，中國文字在逐步實現規範和統一的過程中，一直起主要作用的是許慎的《說文解字》。這是許慎的又一不可磨滅的偉大歷史功績。

清代的小學家將《說文》小篆的形體絕對化了，從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刻意追求本字、本形，將小篆形體加以隸化以代替通行的楷體。例如：將“年”寫成“秊”；將“春”寫成“萑”；將“秋”寫成“𣎵”，甚至寫成“穉”；將“得”寫成“𢇛”；將“許”寫成“鄆”；將“前”寫成“𠂔”；將“造”寫成“𢇛”等等，不一而足。這是完全不必要的，這違反了文字的通用原則，也違反了文字的統一原則，重新制造了混亂。文字形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種發展變化祇能根據文字形體結構的自身規律加以引導。任何試圖將已經發展變化並為大家所公認且得到通行的文字形體，強行加以復古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至於在整理古代文獻的過程中，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原貌，採用“隸古定”的方法，以及書法家為了藝術表現方面的需要寫一些古體字，則另當別論了。

許慎是偉大的，他為我國歷史文化的發展，做出過卓越的貢獻。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和影響，不僅在今天，即使在將來，舉凡研究語言文字學、古文獻學，都離不開《說文解字》這部書，而且所有涉及古代的學科，尤其是歷史、哲學等等，都需要從《說文解字》這部書中尋找資料、線索，以至答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更有必要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一個偉大人物，他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歷史時代範圍之內。他的作用與影響是可以超越時代的，但同時也必然受到時代的局限。任何人的認識範圍祇能是有限的，他所取得的成就不論有多大，也祇能是有限的。許慎這一偉大的歷史人物，也絕不可

能例外。

許慎在探索文字奧秘過程中，已經掌握了文字形體的各種結構基本形態及其基本結構規律，形成了系統的“六書”理論。並且清楚地認識到文字形體的來源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一奧秘的核心。同時還系統地論證了文字是“形聲相益”、“孳乳浸多”這一發展變化的基本規律。這些都是顛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許慎所據以探求文字本形、本音、本義的形體，僅限於戰國以來已經發展變化了的形體，與最初的形體之間，有許多已有很大的差異，這在推求文字本形、本音、本義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出現誤差。這就是許慎本人所無法避免的時代局限性。現在我們已見到了許慎未曾見到的商周時代的文字，這些文字保存了大量的最初文字形體，足以證明許慎在探求文字本形、本音、本義的時候，確實存在著誤差。自清代乾嘉學派以來，小學復興，“說文學”的研究被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種傾向，即認為許慎的所有關於文字的說解，都是絕對正確的，甚至直截了當地稱之為“絕學”。這種思想認識上的僵化是十分有害的。事實上它已使許多有卓越才華的學者，在其成就上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否則的話，他們將會取得更為輝煌的成就，這包括諸如王念孫、錢大昕、段玉裁以至章太炎這些著名的學者在內。

許慎的偉大，在於他創立了“小學”這門學科，同時還為這門學科開拓了無限發展的前景。我們不能要求許慎超越時代所給予他的局限，認識和掌握他無法認識的事物，因此，我們也不能要求許慎對於每個具體文字的說解都是絕對準確無誤的。對於許慎的每一個具體結論不加區分，一律曲意加以維護，從而為之辭的做法，只能給許慎所辛勤開創的事業帶來危害，阻礙其進一步發展。任何學科，只要出現了僵化、絕對化，就不可避免地失去旺盛的活力，這個學科也勢必停滯不前，無法進一步發展了。

現在董蓮池博士應出版社之約，廣泛吸收古文字學界和說文學界的研究成果，融以個人的研究體會，注重形體的客觀分析，實事求是地對許慎說解方面存在的誤差做了全面系統的考正，同時還對文本做了部分校勘、并又加

以句讀和釋音，我相信他的這種學術研究對光大許學，指導人們正確地利用《說文解字》這部偉大著作會大有裨益的，對學術界古漢字的形義研究也會大有幫助的。

是為序。

一九九六年八月於長春

附記：

考正著手時，曾問序恩師，恩師欣然應允，而未及濡翰，便染重疾。後稍愈，命以昔年之文代之，今恩師遽歸道山，痛何可言！謹以此為永恒之憶念。

丁丑年春受業董蓮池敬識

孫氏重刊宋本說文序

唐虞三代五經文字燬于暴秦，而存于《說文》。《說文》不作，幾于不知六義。六義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復識，五經不得其本解。《說文》未作已前，西漢諸儒得壁中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禮記，七十子之徒所作。其釋孔悝鼎銘“興舊耆欲”及“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或多不詞，此其證也。許叔重不枉作，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即史籀大篆九千字，故云敘篆文合以古籀。既并《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以成書，又以壁經鼎彝古文為之左證，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其云古文、籀文者，明本字篆文；其云篆文者，本字即籀、古文。如古文為弌為弌，必先有一字二字，知本字即古文。而世人以《說文》為大小篆，非也。

倉頡之始作，先有文而後有字。六書，象形、指事多為文，會意、諧聲多為字，轉注、假借文字兼之。象形如人為大，鳥為於，龜為𪚩之屬，有側視形、正視形；牛、羊、犬、豕、鬲、兕之屬，有面視形、後視旁視形。如龍之類，从肉指事，以童省諧聲。有形兼事又兼聲，不一而足。諧聲有省聲、轉聲，社土聲，杏從可省聲之屬皆轉聲也。指事別于會意者，會，合也，二字相合為會意，故反正為乏為指事，止戈為武、皿蟲為蠱為會意也。轉注最廣，建類一首，如禎、祥、祉、福、祐同在示部也；同意相受，如禎，祥也；祥，祉，福也；福，祐也。同義轉注以明之。推廣之，如《爾雅·釋詁》：“肇、祖、元、胎，始也。”“始”為建類一首，“肇、祖、元、胎”為同意相受。後人泥“考”、“老”二字，有左回右注之說，是不

求之注義而求其字形，謬矣。

《說文》作後，同時鄭康成注經，晉灼注史，已多引據其文。三國時嚴畯、六朝江式諸人多為其學。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亦本此書增廣文字。至唐，李陽冰習篆書，手為寫定，然不能墨守，或改其筆蹟，今戴侗《六書故》引唐本是也。南唐徐鉉及弟鍇增修其文，各執一見。鍇有《繫傳》，世無善本，而諧聲讀若之字多于鉉本。鉉不知轉聲，即加刪落，又增新附及新修十九文，用俗字作篆。然唐人引《說文》有在新附者，豈鉉有所本與？鍇又有《五音韻譜》，依李舟《切韻》改亂次第，不復分別新附，僅有明刻舊本。

漢人之書多散佚，獨《說文》有完帙，蓋以歷代刻印得存，而傳寫脫誤亦所不免。太氏“一曰”已下，義多假借，後人去之（如祖本始廟，又為祈請道神，見《初學記》引嵇含《祖道賦序》。渾本混流，又為測儀器也，見《太平御覽》。日本太陽之精，又君象也，見《事類賦注》。苛本小草，又曰尤劇也，見《一切經音義》。戲本偏軍，又曰相弄也，見《太平御覽》。此類甚多，姑舉一二）。或節省其文（如稷，田正也，自商已來，周弃主之，見《大觀本草》唐本。橘，碧樹而冬生，見《韻會》。毋，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見《尚書》、《禮記》疏。山，凡天下名山，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見《爾雅釋文》。鮪，一名江豚，多膏少肉，見《晉書音義》。兕，皮堅厚，可以為鎧，嶓冢之山，其獸多兕，見《藝文類聚》）。或失其要義（如月食則望，日食則朔，見《史記正義》，當在有字下。耜，古者天子躬耕，使民如借，見《初學記》。無底曰囊，有底曰囊，見《詩釋文》。大曰潢，小曰洿，天生曰鹵，人生曰鹽，見《一切經音義》。桎，所以質地，梏，所以告天，見《周禮釋文》。甗，瓦器，受六合，見《史記索隱》）。或引字移易（如《御覽》引琛，寶也，乃珍字。《廣韻》引睽，耳不相聽也，乃睽，目不相聽也。《初學記》引池，陂也，即陂下一曰沱也。《一切經音義》引總，蜀布也，乃縵解）。或妄改其文（如坏，丘一成也，見《水經注》、《太平御覽》，今依偽孔傳改作“再成”。墓，兆域也；葑，大也，見《爾雅釋文》及《疏》，今葑作菰，墓作